

做好资本市场“加减法”

本报评论员

上周末,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中国将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这一表态,对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在资本市场上如何作为颇具启发意义。

“大市场、小政府”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当今社会已成为学界共识,也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失政府不断瘦身,大市场不断做大”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指导思想主要依据“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上主要依靠政府强力推进,这就使得政府具备了若干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威权主义色彩。在中国法治不完善与博弈不对等的情况下,威权型政府不仅容易滋生“盛大自

重,拒绝瘦身到底”的倨傲之气,还容易从本位主义的自利考量出发,在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上,选择性地越位、缺位或错位。这种弊端,在财富聚集、利益多元,从而寻租空间巨大的资本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在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提出了本地资产证券化率——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一个主要衡量指标——要达到百分之多少的“N年规划”,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到处寻找新股上市项目。为确保所选定的上市项目能够大功告成,这些地方不借动用资产突击注入、定向减税、土地优惠,甚至亲自去证券监管层公关等非正规手段,可谓无微不至,政府俨然成了公司的大股东。在一些跨地区的上市公司兼并重组案例中,被兼并方所在地的政府往往不甘心甘情愿内的公司被“吃掉”,便人为制造种种障碍,防止“肥水流入外人田”,使得一些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兼并重组屡有始无终。政府做了自己不该做的

事,也使得企业自治成空谈,是为政府职能之“错位”。

又如,对于因业绩变脸或弄虚作假曝光而受到警示的不少ST股,投资者痛感其屡教不改为害甚巨,呼吁监管层令其退市。尽管监管层采取了将某些ST股边缘化的举措,并酝酿出台相关退市政策,但有些ST股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却千方百计为前者保住上市公司地位而努力,使得ST股公司成为退市过程中“老赖”。为了让辖区上市公司数量迅速提升(至少是不少),一些地方出台了凡重组ST股者皆有重奖的激励政策,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亲自操刀重组ST股公司。凡此种种,本属于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是为政府职能之“越位”。

再比如,一些“高耗能、高污染、高风险”的上市公司唯利是图,罔顾社会责任,动辄发生人身安全事故或环境污染事件,媒体和公众对此积极举报,但这些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出于涉事公司是纳税大户和GDP大户的利益关照,对媒体或公众的举报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虚与委蛇,要么为上市公司开脱责任,上市公司的恶行因此被包庇纵容,公众的正义诉求因此得不到伸张。政府的监管责任成为一纸空谈,是为政府职能之“缺位”。

当然,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其中也包括政府职能“到位”做出的贡献。这种“到位”,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在恪守自身权力边界的前提下,大力推动资本市场的制度化建设,依法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逐步做好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努力为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提供服务等。这些“到位”的举措,既有原创,也有借鉴,它记载着中国资本市场建设者集思广益的管理智慧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精神,理当得到应有的积极评价。

但毋庸讳言的是,如果高标准严要求,在处理自身和资本市场的关系上,不少政府各级部门的确存在着上文例举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一方面体现为政府对资本市场关心、参与过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对资本市场监管、把关不足。要矫正前者,就必须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这是“减法”;要改善后者,就必须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这是“加法”。期待在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这道“加减法”考题上,各级政府部门能够交出一份令民众满意的答卷。

APEC经济增长倚重中美双巨轮驱动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发达经济体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却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气候不齐”现象。全球经济重心俨然已经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而亚洲地区则以其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经济平衡增长需中美携手拉动。

王勇

11月10日至14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区域一体化、绿色增长、能源安全以及规划合作等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欧债危机的蔓延和升级、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复苏乏力等都会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影响,为此,这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需强调APEC各成员应同舟共济,在中美双巨轮驱动下,保持经济强劲、可持续、稳定增长。

全球经济步入一体化失衡困境

纵观目前经济形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发达经济体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却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气候不齐”现象,经济复苏都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迅速回落,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速亦开始全面回落。与此同时,全球通胀压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导致各经济体均面临经济下滑与通胀高企的两难境地。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10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增长8万,失业率下降至9%,喜忧参半。而欧元区则在应对欧债危机上仍无建树,但通胀率却在不断攀升。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10月份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为3%,这一比率再次超过了此前市场预期预期的2.8%或2.9%。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面临艰难抉择。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已开始连续两次降息,而印度却仍在加息,通胀水平不一导致货币政策分化迹象。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11月2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已决定仍将保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不变,并且继续推进“扭曲操作”;11月3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却意外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25%。看来,应对欧债危机和保经济增长还是暂时压过了抑制通胀目标。

经济平衡增长需中美携手拉动

首先,中国应将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着力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需求拉动力,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把扩大消费与推进城镇化、保障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今后5年,中国消费增长率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预计进口总规模超过8万亿美元,为拉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美国应设法扭转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局面。尽管美国经济的复苏如履薄冰,而且美国进程将长期而艰难,但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其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依然很大。不过从目前美国经济运行本质来看,只有当其家庭去杠杆化逐渐完成,家庭资产负债表能够平衡,并且让制造业复兴,增加就业岗位,让居民的收入来源更为多元之后,美国经济才能走向真正复苏。为此,美国应尽快采取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再次,中美应坚持“坦诚互信,加强合作”的原则。目前的亚太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中,最为重要的要数中美经济合作。尽管中美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有别,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是正常的,但关键是双方一定要坦诚互信,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通过平等对话与磋商妥善处理存在的分歧,并且进一步加强在医药、能源、高新技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还应以实际行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稳步推进绿色增长,在亚太地区成员中起到引领和带头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

食品合格率为何难换公众满意率

刘俐珉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日前表示,目前,中国有12万多家的食品生产企业获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而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出口食品在国外的检测合格率也在90%以上,整体水平持续稳定提高。

连续几年了,食品合格率都维持在九成以上,这样的数据的确很华丽,按理说,广大消费者应该心满意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舆论对这一数据的态度不是欣喜,而是一脸的不屑和质疑。官方公布的食品合格率难以换来公众的满意率,舆论并不买账,为何?原因大抵有四:

一是抽检食品的范围狭隘。质检部门只着重抽检了证照齐全的正规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忽视了对一些无证生产的欠正规食品生产企业或食品小作坊、小摊贩的抽检。平心而论,后面这些食品生产单位不仅存在,而且数量相当庞大,消费者每天消耗的食品中有相当比例来自这些生产单位,而这些欠规范单位生产的食品合格率要明显低于正规企业生产的食品,食品安全风险很高,质检部门公布的食品合格率中一旦忽略了这一部分,显然就缺少足够的说服力。

二是质检部门只负责监管食品生产环节,而食品安全还要涉及餐饮、流通、农产品生产(由农业、畜牧等部门负责监管)等环节,从目前的形势看,餐饮以及农产品生产等环节暴露出很多

食品安全问题,广为诟病,这些环节的食品合格率又是多少呢?能达到九成吗?食品的合格率应该是一个涵盖整个食品环节的合格率,公众需要的也是这样的食品综合合格率。

三是食品抽检标准陈旧。《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有关部门还没有完成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一揽子整合规范,有不少食品安全标准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落伍了,不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食品需求。譬如,我们可以感性地判断地沟油、泔水油是不合格食品,但是依据现在的检测标准并不能有效地甄别地沟油、泔水油,卫生部还在征集检测方法;还有一些或可存在的有害物质,并不在当前的食品检测范围之内,即便食品中含有这些物质,如果没有引发食品安全事故,也不会被检测出来,实质有害的食品当然就被列为了合格的食品。建立在落伍的食品检验标准基础之上的食品合格率也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合格率。

四是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让民众对食品安全有了一种整体的、被放大的不信任感。这种情绪,也或多或少地拉开了食品合格率与民众满意度之间的差距。

官方公布的食品合格率和民众的满意度之间还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监管部门必须正视差距,找准原因,对症下药,积极应对,进一步扩大食品抽检范围,建立健全科学的、与时俱进的食品检测标准,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引导经营者自律,让食品安全成为常态。如此,食品合格率与民众的满意度才会逐渐缩小差距,直至吻合。



上千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关门过冬

金九银十已成空,楼市惨淡迎寒冬。房产中介忙倒闭,政策调控勿放松。房价调整仍轻巧,民生负担太沉重。刺破泡沫有代价,涅槃之前是阵痛。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民间借贷有了名分还需推进改革

周子勋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同时强调,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4倍;下一步将致力于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民间资本规范从事资金借贷活动,鼓励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

这是央行首次对民间借贷的地位做出定性的结论。虽然与社会大众所理解的民间金融还存在着差距,但对于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资本而言,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地位改变。今后的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关键还是要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这是解决民间金融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必经之路。

从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实际现状来看,不仅民间借贷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与中国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同样密切相连。可能正是靠着民间借贷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才有了今天的地位,进而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面貌,实

现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有一组数据可以加以验证: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上缴的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此外,目前,中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而今年4月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资本市场与中国企业家成长:现状与未来、问题与建议——2011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从企业过去3年已实施的重大融资方式来看,73.5%的企业选择了“长期银行贷款”,55.3%的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14.9%的企业选择了“银团贷款”,10.5%的企业选择了“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而过去3年有62.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就是推动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当前的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融资问题上,因此要解决融资问题就必须从金融信贷方面入手,而扶持中小企业信贷的问题最终需要与之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服务机构。

自温家宝总理在温州之行中提出有关部门研究温州金融试点改革的建议之后,相关部门迅速推进。11月8日,温州市开始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债务危机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案提出积极争取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各类贷款利率在央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4倍内可以自由浮动,由借贷双方自行议定。按照方案,温州市将推进新型金融组织创新,3年内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达120家,注册资本总额800亿元人民币左右,实现中心镇以上全覆盖。此外,全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总数增加到30家,并将农村合作银行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改革任务中还包括,温州市将创办2家-4家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是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供求信息汇集与发布、借贷合约公证和登记、交易款

项结算、资产评估登记和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的机构,目的是促使民间借贷行为阳光化、合法化。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落实将给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带来新的活力,这也正是温州这个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所体现出来的进取精神。

就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言,虽然经过了前期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国有金融绝对垄断的优势依然明显。在这个体制下,信贷紧缩更推动资金流向大型国企,正规金融体系完全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垄断亦会陷入高利贷危机的恶性循环。因此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在于推进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尤其是推动小微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温家宝总理曾说:“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正门开得不大,那旁门就要开。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

因此,央行对民间借贷的定位本身算得上是给了一个名分,但民间金融最终会走向何方,关键还需要金融改革,从法律和政策上真正得到认可。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